

· 河南当代文学研究 ·

DOI:10.3969/j.issn.1003-0964.2020.06.020

# 论刘震云小说的荒诞书写及其局限

——以《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为例

王云杉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重复作为刘震云小说的叙述模式,体现出作家对于人生荒诞感的认知。《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荒诞书写的代表作品,但小说人物存在符号化、简单化倾向和“想当然”意味,偏离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同时,小说结尾将主人公的悲剧置换为另一批人的喜剧,具有较为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降低了作品的思想启蒙力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两部小说体现出刘震云在运用西方文学资源本土化方面的不足之处,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我不是潘金莲》;荒诞书写

OSID: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0)06-0112-06

刘震云小说在情节、人物、场景等方面,存在颇多明显的重复现象,给人们一种“似曾相识”的阅读印象。米勒认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sup>[1]3</sup>在米勒看来,重复不仅存在于一部作品的内部,而且还涉及这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创作谱系。《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新世纪小说创作的新探索,学界对其褒贬不一。本文以这两部小说的重复书写为切入点,梳理并归纳刘震云小说的叙述模式和思想内涵,由此分析其小说在荒诞书写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及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

## 一、小说的情节模式与基本主题的重复书写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延续刘震云小说以往的叙述风格,作品自身存在诸多重复之处。作品主要线索是农村妇女牛小丽寻找宋彩霞的故事,并且将几起政府高级官员落马的故事串联在其中。“一部像小说那样的长篇作品,不管它的读者属于哪一种类型,它的解读多半要通过重复,以及重复所产生的意义的鉴定来完成”<sup>[2]14</sup>。由此,刘震云作品内部的重复之处,值得推敲。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自身具有多种重复性因素。例如,在情节设置方面,人物处于欺骗/被欺骗的生存处境。牛小丽被宋彩霞以“假结婚”的圈套,骗走一笔巨大的钱财,随后又被

老辛夫妇欺骗。同时,老辛又被自己的妻子欺骗。牛小丽迫于种种压力,接受皮条客苏爽的安排,假扮处女,与诸多政府官员发生不正当关系。又如,小说场景的重复。冯锦华婚后出轨被牛小丽审问,其口干舌燥、饥渴难耐的煎熬状态与官员杨开拓被纪委审查时候的困顿处境,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之处。当然,仅从作品内部出发,人们不容易理解小说情节、场景等重复要素所体现的艺术宗旨。我们还应该将两部小说放置在刘震云的创作谱系中进行考察。

从人物关系的设置方面,《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与《我不是潘金莲》都对《水浒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戏仿,如李雪莲与潘金莲、牛小实与武大郎都形成了一定的对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核心情节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的主人公都为了寻找一句话,而走上不同的人生“旅程”。李雪莲经历一系列曲折的事情之后,本来已经放弃告状的念头,她只想从前夫那里得到一句话,那就是离婚的真假问题,以平息自己的委屈,开启新的生活。但此时,前夫污蔑李雪莲是潘金莲,又把她推上告状之路。证明“我不是潘金莲”这句话的正确性,成为李雪莲上访的最终动力。牛小丽与未婚夫冯锦华的对话,阐明了牛小丽寻找宋彩霞的最终目的,“想当面问她一句话……头一回跟她见面,我把她当成老实人,她从哪里看出,我是个傻×?”<sup>[3]24</sup>可以说,李雪

收稿日期:2020-08-0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20ZWC005)

作者简介:王云杉(1993—),男,云南昆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世纪文学。

莲和牛小丽踏上“寻找”之路的根本动机基本是相同的。在相似的动机下,李雪莲和牛小丽的某些遭遇存在颇多相似之处。首先,在身份上,她们都成为自己厌恶的“另一个”人物角色。李雪莲在前往北京之前,曾经以自己的肉身为诱饵,怂恿老胡杀掉自己的仇家,险些成为潘金莲。随后,各级官员为了防止李雪莲进京告状,派人守在李雪莲的家门口。赵大头与李雪莲“假结婚”,并且发生性关系,这种关系让李雪莲成为名副其实的“潘金莲”。牛小丽为了借钱和还债,多次向屠小锐出卖自己的身体,此时的她险些成为另一个宋彩霞。另外,牛小丽小时候看见母亲与人通奸的场景,并且赶跑了母亲。牛小丽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牛小实的“母亲”,最后,当牛小丽在寻找宋彩霞的路途上,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时,不得不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各路高官,并对自己的客人说,她就是宋彩霞。由此,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由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在人生结局上,牛小丽和李雪莲也有相似之处。在小说中,人物预想的事情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大相径庭。李雪莲发现自己被赵大头欺骗之后,再次踏上告状的旅途。李雪莲在前往北京的大巴车上,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被人送往小镇上的医院。为了赶时间和还医疗欠款,李雪莲被送到北京。最后,当前夫秦玉河意外死亡的消息传来,李雪莲感到告状已经成为不可能,而且自己若干年的努力也付之东流。牛小丽用卖身换来的本钱经营小吃店,原本已经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后卷入一连串官场腐败的案件之中,被前来办案的警察逮捕。从牛小丽悄悄给冯锦华塞银行卡的细节来看,她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被现实无情毁灭。由此,在两部小说中,发生在主要人物身上的事情,由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

在刘震云新世纪小说创作中,《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的叙述模式又与《一句顶一万句》存在重复。《一句顶一万句》在一些细节、语言表述、句式结构以及上、下两个部分的情节等方面,都存在较多的重复,这一点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总体上看,《一句顶一万句》的情节模式可以用作者的原话来概括,即一件事成为另一件事。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在身份上,同样由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吴摩西出门寻找吴香香本属于“假找”,但未料到女儿巧玲被人拐走。于是,吴摩西寻找妻子成为“真找”,并且找遍了自己在谎言中凭空想象出来的城市。多年之后,吴摩西的后代牛爱国寻找妻子庞丽娜同样属于“假找”,后来,牛爱国为了“寻找”母亲遗留的一句

话和一些往事,又去找吴摩西的后代。由此,两代人的“假找”成为“真找”。一件原本属于“假”的事情,变成另一件“真”的事情。此外,吴摩西生前最爱看罗长礼喊丧,最后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罗长礼。牛爱国的妻子庞丽娜与小蒋通奸,后来牛爱国与章楚红同样发生不正当关系。由此,牛爱国变成小蒋,章楚红变成庞丽娜。

通过分析,人们可以看到刘震云以上几部小说的人物、情节、场景等要素存在很强的相似性,重复成为作家的一套小说叙述模式。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归纳出柏拉图式和尼采式两种重复的类型,“前者精确地将世界定义为摹本或表现,它将世界视为图像;后者与前者针锋相对,将世界定义为幻影,它将世界描绘为幻象”<sup>[1]7</sup>。柏拉图式重复强调不同的事物都源于对同一种原型的模仿,尼采式重复则强调存在本质差别的事物虽然没有一个共同的模板,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又存在一些微妙的相似性。在刘震云以上几部小说中,人们看到两种类型的重复:一件事情变成另一件事情,一个人物成为另一个人物。应该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所体现的重复,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能够找到一个原始的叙述模式。因此,刘震云小说更接近米勒所说的柏拉图式重复。应该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的小说叙述模式无疑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重复作为刘震云小说的叙述模式,体现了作家对于人生命运荒诞感的认识。在小说中,无论是上访还是找人的故事情节,主人公尝试为自己设立一个看似实有、实则虚无的目标,试图在追寻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然而,人物为一个虚幻的人生目标,所付出的千辛万苦却总是换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悲剧性结局,这种情节模式接近西西弗斯<sup>①</sup>式的故事原型。

刘震云小说“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的叙述模式,展现了生活与现实的荒诞性,与西方文学的异化主题、荒诞意识具有一定的关联。《我不是潘金莲》讲述李雪莲上访和官员落马两种类型的故事,作者将它们分别归纳为“芝麻”和“西瓜”、“蚂蚁”和“大象”,并且展现前者演变为后者的过程。一方面,李雪莲当年“误入”人民大会堂,意外地将自己的冤情传递到重要领导人耳中;另一方面,省长储清廉误解领导人的讲话,向上级建议,撤销一系列官员的职务。一件偶然的小事滚雪球一般发展,终于酝酿成为一系列大事。《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讲述桥梁上偶然发生的烟花爆炸案。公路局局长杨开拓落马之后,省长李安邦和农村妇女牛小丽也被牵连到复杂

的案件当中。在异化和生存荒诞性主题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与卡夫卡式荒诞文学存在一定的呼应。

刘震云小说“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叙述模式所展现的人生命运的荒诞感,与加缪式的荒诞文学也存在一定的精神联系。《我不是潘金莲》的主人公李雪莲被命运嘲弄,最后几乎成为名副其实的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叙述牛小丽在寻人过程中,变成宋彩霞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都写出人与自我,以及人与人之间陌生和隔膜的生存状态。加缪《西西弗神话》对于荒诞感的界定包含人与世界和人与人两方面的关系。荒诞意味着原本熟悉的世界在人们面前,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机械而重复的生活带给人的厌倦感,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说:“它们(世界)远离我们。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某段时间里,突然感到平日很熟悉的一个女人的面孔变得完全陌生,而他曾经爱恋过她几个月或几年,可能我们甚至渴望那些使我们突然置身于孤独之中的东西……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就是荒谬。世人也散发出非人的因素。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机械的动作,他们毫无意义的手势使得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荒谬起来。”<sup>[4]17-18</sup>应该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的叙述模式所展现的荒诞性主题,与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具有一定的勾连,表现出了较高的思想价值。

## 二、人物形象的模糊化与批判精神的弱化

目前,不少论者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等角度解读刘震云小说,阐述小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sup>[5]</sup>。不过,也有论者对小说的荒诞书写提出质疑,认为小说写得过于“聪明”,失于轻佻<sup>[6]</sup>。笔者认为,仅仅以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评价刘震云作品,或许会将问题简单化。我们对于刘震云作品的评价,一方面需要建立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还需要将它们放置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维度上,谨慎地进行思索,从而做出更加中肯的判断。

总体上看,刘震云小说的荒诞书写同样具有诸多艺术缺憾,降低了作品的批判力度。

首先,两部作品在主人公的塑造方面,存在符号化、概念化的弊病。同时,小说部分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有些矛盾,不够自然流畅,甚至有些突兀。《我不是潘金莲》故事到了“二十年后”部分,作家描写李雪莲与马文彬等官员发生的言语冲突,并且再次下决心进京告状的故事。从全书来看,证明“我不是潘金莲”的客观性,才是李雪莲20年以来不断告状的

根本动力,证明这句话的合理性需要两个支点:一是李雪莲证明自我清白的情感诉求;二是李雪莲保持单身状态,后者更为重要。李雪莲在初次告状成功之后,两个支点都受到极大的动摇。一方面,能够与李雪莲说得上话的一头牛“否定”告状能够成功,几乎让李雪莲放弃告状的念头。换言之,李雪莲失去告状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中学同学赵大头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劝导”李雪莲放弃告状,并且向她求婚,让她真动了心思。从这两方面来看,李雪莲“二十年”后的告状,几乎失去所有动力。随后,李雪莲与马文彬等官员产生言语冲突,再次走上告状的道路。由此,李雪莲进京告状的目的由证明“我不是潘金莲”被置换为惩罚官员。换言之,李雪莲再度上访,并非为了满足一个鲜活生命个体的情感诉求,而是证明“官逼民反”的古老伦理学命题,这体现作家潜在的观念对于作品的影响。作家描写李雪莲与马文彬等人的关系是为了展现人与人之间不能交流,无话可说的境地,同时以反讽的手法,表现官员的虚伪、狡诈等卑劣品质,以及凸显权力对人性的影响。尽管作家在故事的结尾对李雪莲告状失败的结局表达同情和怜悯之心,但是由于主人公塑造存在符号化、概念化弊病,降低了小说荒诞书写的批判力度。

其次,作家对于笔下的小人物,缺乏同情与怜悯的态度。如果说《我不是潘金莲》对于李雪莲尚有一些同情,那么到了《吃瓜时代儿女们》,作者对于主人公牛小丽则缺乏基本的同情,甚至存在将弱势群体他者化的嫌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没有说明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借用论者发表的评论:“时空背景越来越弱化,同时越加抽象和象征化。”<sup>[7]</sup>从小说的相关描写来看,牛小丽生活的地方存在不少拐卖妇女的丑恶现象,让人猜想此地应是经济发展非常落后的偏远地区。在小说中,当牛小丽发现宋彩霞骗婚的事实之后,为了还清债务,准备将身体出卖给屠小锐,却反被对方羞辱一番。在寻找宋彩霞的路上,牛小丽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时,皮条客苏爽引诱她走上卖身的道路。苏爽劝牛小丽放弃寻找宋彩霞,理由是“能把自己身子卖出去的人,一定是穷人;亿万富翁的女儿,不会自卖其身;正因为是穷人,她家一定是无底洞,钱一到手,早不知花到哪儿去了;就像一个石子投到海里,‘扑通’一声就没了”<sup>[3]76</sup>。这句话虽然无关小说的主题意旨,但是却深刻地体现出弱势群体卑微的生存现状。牛小丽属于底层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弱势群体。在小说“附录一”部分,牛小丽(宋彩霞)被无数“吃瓜群众”肆意嘲笑。在这里,人们看不到作家对于网络时代浮躁风气的批判,

以及对牛小丽这类小人物应有的同情。

再次,《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对官员的描写都带有“想当然”的意味,进一步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量。作家塑造王公道、苟正义、史为民、董宪法等官员形象,仅从人物命名,读者就可以看到作家对于官场的讽刺之意。然而,这些脸谱化的人物显然难以承担起小说的批判任务。相比而言,市长马文彬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与其他人物相比,具有更多的批判力量。不过,最为重要的是,《我不是潘金莲》部分荒诞不经的情节不仅在艺术上缺乏逻辑,而且也严重违背现实生活逻辑,降低了小说的现实批判性和生活哲理性。按照小说的描述,20年前,李雪莲告状引发一系列官场人事变动,审判员王公道被牵连其中,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后来,王公道又成为法院院长,与其他政府官员合力阻止李雪莲上访。这些情节明显缺乏文学和现实的逻辑。关于西方荒诞文学,郜元宝认为卡夫卡小说《审判》并非不讲逻辑,而是讲出另一套逻辑,“将极端的真实和极端的荒谬结合起来”<sup>[8]143</sup>。郜元宝认为部分中国当代作家未能适当地模仿卡夫卡小说的逻辑,更高的逻辑没有抓住,反而破坏小说必须遵守的基本逻辑,结果作品让读者感到弄巧成拙。在这里,《我不是潘金莲》所描写的官场人事变动,似乎也违背小说的艺术逻辑和生活逻辑,具有较大的文学叙述缺陷。

总而言之,以上两部小说的人物存在符号化、概念化、简单化倾向。具体地说,人物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其一言一行皆听从作家声音的指挥。换言之,主人公们被动地成为作家思想观念的传声筒。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对于吴摩西、牛爱国在寻人过程中的情感活动,皆有较为充分的表现。因此,当命运在两代人之间出现循环往复的时候,小说故事的悲凉感显得意味深长,同时作家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体现出一定的深度和厚度。与之相比,《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主人公,其性格没有随着情节的推进而发生变化。在小说中,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员,其情感与心理活动始终保持着固定化、平面化的状态。进而言之,刘震云的两部近作似乎在较大程度上偏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品质。按照人们的理解,文学是人学,其内容往往表现作家对于人的情感、价值、尊严、命运的深刻思考。周作人五四时期提出“人的文学”的概念,“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sup>[9]104</sup>。在周作人看来,作家描写正面的、理想的生活,人的平常生活,或者非人的生活,

都属于这个概念的范畴之内。同时,“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差别,取决于作者的态度,“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sup>[9]105</sup>。从这里看,关键问题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如果作家描写痛苦、悲惨、荒诞的人类生活处境,则需要表现批判或者超越的态度,而不能停留在现实和人生的表象层面。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来看,无论是“吃瓜群众”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炒作方式,还是官员们逢场作戏的生活态度,一大批面目模糊、缺乏个性的人物难以支撑小说美学方面的悲壮感,难以表现具有崇高性的思想命题,使得作品缺乏现代文学的精神品质。

周作人以“人学”的角度看待“文学”,指出新文学所具备的人道主义思想特质,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说法继承了“人的文学”的理论。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钱谷融认为,高尔基将文学视为人学的主张,属于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创作和理论都不能离开这个命题。由此,钱谷融推崇人道主义思想资源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被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用同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sup>[10]56</sup>。从以上两部作品来看,作者能否抵达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处,表现普通人丰富的生活情感,复杂的心灵活动,似乎让人有所质疑。由此,两部作品尽管都具有一定的哲理性,但是存在着思想大于人物、内容与形式不太协调的艺术缺陷。除了人物塑造,作者以戏剧性故事结尾,消解人物反抗命运的勇气和决心,体现悲观失望的生活情绪,这无疑属于另外一种艺术局限性所在。

### 三、一地鸡毛式大结局与悲观主义色彩

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独特的目录设置方法已经被论者注意到,但是人们对于这两部小说的结尾讨论不多。结尾在整部小说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具有建构或颠覆主题的功能。按照戴维·洛奇的说法,小说结尾不同于文本的最后几页纸,“前者是对读者头脑中有关小说内容产生的疑问所做的圆满解答或者故意不解答,后者则常常作为一种附记或附言,是话语接近尾声时一种平缓的减速”<sup>[11]269</sup>。戴维·洛奇通过解读诸多经典小说名篇,说明结尾对于文本细读的重要意义,对于研究

刘震云小说具有较大的启示。从目录看来,这两部小说的“结尾”不仅使得创作活动接近“完成时”,而且体现作家对于故事和人物的认识。《我不是潘金莲》目录:“第一章 序言:那一年;第二章 序言:二十年后;第三章 正文:玩呢。”《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目录:“第一部分 前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第二部分 前言:你认识所有人;第三部分 正文:洗脚屋。”从内容比例上,两部小说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占据绝大部分篇幅,而第三部分“正文”反而成为小说的结尾,在全书所占的比重虽小,但却值得分析。

《我不是潘金莲》结尾讲述前县长老史借用李雪莲上访的方式,举起一块写着“我要申冤”的牌子,被两个协警送回老家的故事。《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结尾主要叙述官员马忠诚从外地返回单位的经历。马忠诚与省长夫人非法发生关系之后,又被“钓鱼执法”的人员敲诈勒索一番,而这一系列故事与牛小丽失身具有遥远的关系。在刘震云的两部小说中,官员高高在上的等级秩序不但被作家颠覆,还遭到一番嘲弄和讽刺,这种写作方式无疑具有较强的狂欢意味。应该说,作家对官员、官场、权力的批判,这一主题与前文的荒诞性主题并不冲突,二者可以融合在一起,但作家对于生存荒诞的理性思考还不够深入。两部小说的故事结局都给人“鸡零狗碎”的阅读印象,这让人们回想起《单位》和《一地鸡毛》等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叙述普通小人物琐碎平庸的生命流水账,表现他们渐渐对生活妥协的过程,体现人的生存和命运的不可捉摸和荒诞性。一方面,《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在异化和荒诞主题上,与《单位》等作品存在相通之处;另一方面,这些小说的结尾无疑具有悲观色彩,体现人在生存面前的脆弱和无力。在这两部新写实小说中,生存取代其他需求,几乎成为人唯一的奋斗目标。有论者对刘震云新写实小说提出质疑,认为它们“没有精神性的力量等形而上的气质,也没有之前的作品《塔铺》和《新兵连》里人与人的那种真情,人在挣扎中奋进的力量等”<sup>[12]</sup>。这样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所表现世界和生活的荒诞感,使得小说带有虚无和悲观的意味,降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激励作用。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的“正文”都是“一地鸡毛”式的结局,似乎意味着人在荒诞现实面前,丧失了奋斗和抗争的可能性,缺少本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乐观信念,还有西方西西弗斯式的抗争精神。荒诞派作家以多种现代主义艺术形

式展现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最终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消除恐惧、焦虑、绝望的心理,并且勇敢地面对带有不确定性的未来生活。艾斯林指出西方荒诞派文学的意义在于“使观看者面对人的疯狂处境,使他能够看见他处境的全部严峻和绝望。消除了幻觉和隐隐约约的恐惧和焦虑之感,观看者能够意识清醒地面对他的处境,而不是在委婉话语和乐观主义的幻想下面,模糊地感觉他的处境。通过观看系统表现出来的他的幻想,他就能从这种幻想中解放自己”<sup>[13]287-288</sup>。《等待戈多》与西西弗斯的故事原型,一方面揭示人类生存处境的荒诞感;另一方面也表现人们通过抗争和奋斗,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向往。

相比而言,《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结局带有一种对人生悲观失望的无奈叹息。李雪莲多年上访被官方成功地制止,而前县长老史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再次套用上访的方式;牛小丽失身成为宋彩霞,反而给马忠诚得到升迁的机会。小说“序言”“前言”叙述主人公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按照一般的阅读期待,小说结尾似乎应该给人看到一丝生活的希望。然而,两部小说的结尾将主人公沉重的悲剧置换为另一批人轻松的喜剧,具有较为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和悲观情绪,似乎暗示着人在荒诞现实面前,很难有所作为,缺少反抗命运的力量。小说中的悲剧故事虽然体现了生存现实的荒诞不经,但是人物对现实的抗争精神,也在带有狂欢意味的故事中被无形消解。或许是作家未能更好地处理新闻素材与文学写作之间的转换关系,导致了小说带有悲观和虚无的意味,不能对读者的现实人生进行思想启蒙。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讲故事的人》《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等文章中,梳理了新闻、消息与叙事艺术之间的微妙联系。本雅明认为,新闻报道和消息追求简洁易懂的风格,并且将那些被解释得一清二楚的事件传输给人们。由于新闻报道呈现爆炸式的信息量,导致人们的想象力和经验走向匮乏。与小说故事相比,新闻文体显然缺乏想象力。小说属于讲故事的艺术。作家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如果将其解释得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很有可能降低小说的美感。本雅明认为,新闻、消息与叙事艺术的内在逻辑路径不一样,后者需要个人的创造和加工,“讲故事不像消息和报道一样,着眼于传达事情的精华。它把世态人情沉浸于讲故事者的生活,以求把这些内容从他身上释放出来”<sup>[14]101-102</sup>。由此,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将新闻转换为文学经验,成为对作家虚构和想象能力的考验。小说属于作家个人经验积累起来的产物,而个人经验不可能

完全脱离集体经验,后者可以对前者进行补充。关键问题在于,作家只有将新闻报道呈现的集体经验进行个人化的处理之后,或许才能摆脱“经验贫乏”的艺术症候。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取材于人们熟知的新闻报道。上访和官场腐败等事件在刘震云笔下,不仅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讽刺,而且体现了人们的荒诞生存处境。然而,作家对于集体经验与个人经验之间的转换,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在现实生活中不乏荒诞不经的事情,它们成为小说家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刘震云认为,生活就像一个深渊,荒诞没有底线,“我想写中国社会的逻辑:一件事经常会变成另一件事,直到变成八件事。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随时都发生在我们身边”<sup>[15]</sup>。《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和《我不是潘金莲》都尝试将日常生活中荒诞的事件转换为小说叙述,表达作家对世间万象和人生命运的思考。由此,作家如何创造性地使用中外文学创作资源,提高作品的文学水准,成为创作的关键点之一。於可训认为:“刘震云是一位把中国文学传统中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艺术和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暴露艺术发挥到极致,同时又兼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的反讽意味的小说家。”<sup>[16]</sup>刘震云近作和一些新写实旧作都具有一些现代派小说意味。当然,在小说中,荒诞不经的故事并非等同于“荒诞精神”。作家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观察自己描写的现实。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仅需要提高作品思想层面的深度,而且还不应该放弃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对于西方文学创作资源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刘震云近作给人们留下诸多思考空间。

#### 注释:

- ① 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更加悲剧的俄狄浦斯王类似,西西弗斯是科林斯的建立者和国王。他甚至一度绑架了死神,让世间没有了死亡。最后,西西弗斯触

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 参考文献:

- [1] 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2] 赵一凡,张中载,李国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1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 [3]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 [4]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5] 张晓晴.《我不是潘金莲》:直抵存在之困[N].中华读书报,2019-09-19(09).
- [6] 孟繁华.没有潮流的文学年代——2012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J].小说评论,2013(1):4-13.
- [7] 徐勇.空间哲学家刘震云——关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及其他[J].扬子江评论,2018(1):76-80.
- [8] 郜元宝.小说说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 [9] 周作人.人的文学[M]//.北京大学.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10] 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11]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卢丽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12] 刘海燕.文学如何越过“一地鸡毛”的人生[J].莽原,2019(6):35-38.
- [13] 艾斯林.荒诞派戏剧[J].华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14] 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15] 河西.刘震云:荒诞没有底线[J].南风窗,2012(19):94-95.
- [16] 於可训.刘震云专辑——主持人的话[J].小说评论,2002(3):26-27.

## On the Absurd Writing and Its Limitations in LIU Zhenyun's Novels

—A Case Study of Children in the Eating Melon Age and I Am Not Pan Jinlian

WANG Yunshan

(Research Center for New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ive patterns of Repeating in Children in the Eating Melon Age and I Am Not PAN Jinlian reveal the absurdity of human existence. However, the artistic limitations of the novel have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have the tendency to symbolize, simplify and "take it for granted".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the tragedy of the protagonist is replaced with a comedy of another group of people, which has a relatively strong pessimistic color and weakens the realistic critical edge of the work. The two novels reflect LIU Zhenyun's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resources, and have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Key words:** LIU Zhenyun; Children of the Eating Melon Age; I Am Not Pan Jinlian; absurd writing

(责任编辑:韩大强)